

新生

文摘

XinSheng.net | 2022年10月第49期

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埋着一颗善良的种子，能守住这份善良，这个生命就是有希望的。圣哲的责任就在于帮助、唤醒人们找回良知本性，使他们回到正道上。君子每天都要省察自己的一言一行和起心动念是否符合天理。

新生文摘

2022年10月 第49期

目录

- 丰富多彩的成语文化·····3
- 西斯廷礼拜堂天顶壁画 先知想告诉我们什么?·····5
- 古文里的大智慧——张仲景《伤寒论》序言·····7
- 一步之遥的清涼·····8
- 建安神医董奉传奇·····9
- 突发突止的古希腊瘟疫·····10
- 善良一念的力量有多大?·····11
- 医学博士：养生之道 修真善忍·····12
- 危难中的仁义·····13
- 轰动芬兰的一个轮回故事·····14
- 刚出生就能说话的婴儿·····15
- 前生乱佛法，今世饥寒苦·····16
- 进化论的三大证据相继破灭·····17
- 幸大莫过于为善 哀大莫过于为恶·····18
- 女教师一生节俭 百万遗产留给学生·····20
- 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21
- 无辜还是万恶·····32
- “认命”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33
- 苏轼逆境中的豁达：也无风雨也无晴·····34
- 找到幸福·····35

丰富多彩的成语文化

文/智真

成语是汉语中经过长期使用、锤炼而形成的固定短语，简洁精辟，多由四字组成，如“有声有色”；也有三字或四字以上的，如“桃李满天下”、“有志者事竟成”等，反映、表现出缤纷多彩的人文世界，人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道德伦理等诸多方面，其中蕴涵着民族文化各类思想和行为的趋向和准则，是汉民族文化心态的生动、可感的写照。

成语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神话故事，如开天辟地、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八仙过海、天衣无缝、点石成金等。二是寓言故事，如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拔苗助长、滥竽充数、亡羊补牢等。三是历史典故，其中有古书上的成句，也有从古人文章中压缩而成的词组，还有融入外来文化而出现的以及来自人民口语常说的习用语。儒道释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三教思想在成语中都有大量的反映，很多成语源于儒道释文化中的经典和故事。还有一些历史故事如完璧归赵、负荆请罪、一鼓作气、破釜沉舟等。四是文人作品，如世外桃源、乘风破浪、老骥伏枥、水落石出等。成语数量庞大，形式完整，内容精练。

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主导地位，体现儒家文化中关于人的品德修养和处事原则方面的成语典故比比皆是。如“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子路请教孔子什么样的人才是“成人”，孔子说：“在利益面前，首先要考虑它是否符合道义，在逆境面前，也不忘自己平日的诺言，这是最起码的成人标准了”；“见贤思齐”（《论语·里仁》），指遇到比自己贤能的人不应嫉妒，要学习对方的美德，使自己改进向善，成为贤能的人；“过化存神”（《论语·学而》），意为君子所经过的地方，人们都会受到他的感化，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指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

正而天下归之”；“浩然正气”（《孟子·公孙丑上》），指正大刚直的精神，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此外，还有“见义勇为”、“博施济众”、“与人为善”、“择善而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

“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等成语都是道家思想的反映。有许多成语出自《老子》：如“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意思是说天道不分亲疏，对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但行善是符合天道的，所以天道总是与善良的人同在，使其做事有如神助；“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原作“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意思是天道之网广大而宽疏，但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谁作恶就要受到天理的惩罚；“天长地久”，是指跟天和地存在的时间那样长，形容时间悠久，也形容永远不变；“上善若水”，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指人崇高境界的善行就象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无所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比喻事情的成功，是从小到大逐渐积累起来的，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此外，还有“见素抱朴”、“大音希声”、“出神入化”、“内圣外王”、“功成不居”等。

儒道是本土文化，释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佛家文化在中国扎根并发扬光大，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汉语的语言和语汇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成语有着浓厚的佛家文化气息，并蕴含着深刻的佛家慈悲普度的思想，如“佛法无边”、“佛光普照”、“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等；“明心见性”、“一尘不染”、“勇猛精进”等成语描述修炼人同化佛法，修心去业，保持心地纯净及不断向上升华的状态；“神通广大”指神奇的功能、法力广大无边，无所不能；“五体投地”比喻佩

服到了极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则是“因果报应”的体现，劝人行善向善，给人以警醒和启迪。

成语准确而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对人生看法、社会认识等许多富有哲理性的思想，如做人要“安贫乐道”、“明辨是非”、“正气凛然”、“满招损，谦受益”等。人们在生活中的不同形态也得到体现，如“温良恭俭让”，就表现出人们在生活中要做到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逊。成语故事是我国历史的一部份，每一个成语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经过历史的积淀，千万人的口口叮传，每一句成语又是那么深刻隽永、言简意赅，使人了解历史、通达事理。如俞伯牙、钟子期的“高山流水”、张良的“运筹帷幄”、诸葛亮的“鞠躬尽瘁”、祖逖的“闻鸡起舞”、王羲之的“入木三分”、富弼的“德高望重”、岳飞的“精忠报国”。

成语对民族文化艺术的反映。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产生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文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都是民族精神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这些艺术内容也必然反映到成语当中去，如反映文学的“文以载道”，书法的“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绘画的“妙手丹青”、“吴带当风”。再例如音乐：我国古代的音乐文化相当发达且有特色，将一些反映音乐的成语串联起来，就会显现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内容。从“丝竹管弦”、“金石弦丝”、“钟鼓齐鸣”等成语中，人们可以了解到我国古代的乐器；“黄钟大吕”、“五音六律”等成语，记录了我国古代特有的音乐理论“十二音律”和由此形成的宫调理论；“尽善尽美”、“余音绕梁”反映了古人对音乐境界的追求。其它艺术都可以从成语中比较系统、完整地了解它们的基本面貌和由此生发出来的价值观。

成语中出现的山水、植物、动物、器物，每一种形象都包含有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成语描绘出“繁花似锦”、“绿草如茵”、“山明水秀”、“鸟语花香”等自然景观；描绘出“万象更新”、“欣欣向荣”等活泼、充满生机的气象；松柏、梅、莲等以其特有的品性还往往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如“岁寒知松柏”，梅“傲雪凌霜”，莲“出淤泥而不染”。山水在成语中不仅是具有普通的地理意义，也

被赋予象征内涵，如泰山在中国人心中，是高大、庄重、神圣的象征，它是五岳之首，五岳之尊，成语有“安（稳）如泰山”，比喻象泰山一样稳固，不可动摇；“登泰山而小天下”，比喻登高望远，眼界开阔；“泰山不让土壤”，指泰山不拒绝细小的土石，故能成其大，比喻人包容的胸襟；“泰山北斗”，比喻因德高望重而为众人所敬仰的人。

常用以取材于动物的成语数目也很多。如龙、凤、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神异的动物形象，它们以高贵、威严、祥瑞被作为吉祥的象征，著名成语有“龙飞凤舞”，出自宋代苏轼《表忠观碑》：“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用于形容奔放雄壮的气势或生动活泼的姿态；“百鸟朝凤”出自《唐书》：“海州言凤见于城上，群鸟数百随之，东北飞向苍梧山”，用于比喻德高望重者乃众望所归；“凤鸣麟出”：指凤凰鸣唱，麒麟出现，用于比喻贤人出现。

在华夏文明史上，古人通过铸鼎等这些具有原始象征意义的金玉器物来敬天敬神，尊崇有德，昭示上天赐福于有德之人，金玉文化无处不见。著名的成语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谓人的诚心所到，能感动天地，使金石为之开裂。玉文化则将古人对理想道德崇高境界之追求，比附于玉之坚洁精美，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君子比德于玉”的传统，佩玉成了君子有德的象征。与玉有关的成语有“如圭如璋”，《诗经》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璋”，圭、璋是古代非常贵重的玉制礼器，象圭和璋一样，比喻君子纯清美好的本质；“冰清玉洁”，出自司马迁《与挚伯陵书》：“伏唯伯陵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形容人品象冰那样清澈透明，象玉那样洁白无瑕，操行清白，品格高洁。

中国成语文化内涵博大精深，集中、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征，它凝聚了几千年中国人文化发展的演变历程，将传统道德理念根植人心。启迪和鼓舞人们：敬天知命，追随大道，有“俯仰无愧”的坦白胸襟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尚品德。◇

西斯廷礼拜堂天顶壁画 先知想告诉我们什么？

文/Yvonne Marcotte

编译/嘉莲



小礼拜堂天顶下弥漫着石膏的霉味。艺术家站在离地面20米（68呎）的脚手架（鹰架）平台上，快速创作一幅又一幅湿壁画作品。

沿着西斯廷礼拜堂高高的筒形拱顶边缘，文艺复兴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画了十二位先知——七男五女。在艺术家笔下，这些人物或深思，或阅读、书写，聆听上帝对他们说话。

如今，参观者伸长脖子仰望着这些人物时，可能会想，这些先知是否有什么信息传给这个时代的我们呢？

米开朗基罗从《旧约》中挑选了七位男性先知——约拿（Jonah）、耶利米（Jeremiah）、

以西结（Ezekiel）、约珥（Joel）、撒迦利亚（Zechariah）、以赛亚（Isaiah）和但以理（Daniel）。

《圣经》中他们的故事人们都很熟悉：约拿害怕给人们带去坏消息而试图逃离时，被神安排的大鱼吞入腹中三天三夜；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将遭灭亡时流泪了；以西结也预言了耶路撒冷的覆灭，但他说以色列会复兴。

约珥告诫人们要忏悔罪过；撒迦利亚预言和平君王（耶稣）将骑龙驹进入耶路撒冷；以赛亚预言了耶稣的受难；众所周知，但以理几次为国王解梦，被扔进狮子坑却毫发无伤。

女性先知们不甚出名，古代希腊罗马称之为西比拉（又译西比尔，Sibyl）。女性先知们的名字是用圣所或庙宇的位置名称来取名。米开朗基罗描绘的五位女先知，分别称做波斯（Persian）、埃里色雷（Erythraean）、德尔斐（Delphi）、库迈（Cumaean）和利比亚（Libyan）女先知。

埃里色雷是土耳其西海岸爱奥尼亚的小镇，女先知在阿波罗神谕处发布预言，史载她预言了特洛伊战争与《荷马史诗》，还对基督的到来做出了极精准的陈述。

非洲北部的波斯女先知预言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功绩；利比亚女先知在利比亚沙漠的宙斯——阿蒙神谕处做出预言；库迈女先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库迈主持阿波罗神庙；德尔斐女先知在著名的希腊德尔斐神谕处进行占卜。

米开朗基罗将古典世界的女先知纳入天顶画，表明神启预言不仅针对宗教信仰徒，也是宣示给全人类的。

据说，米开朗基罗考虑到助手们技巧不足，不让他们参与天顶画。他花了四年时间，于1512年独立完成了所有创作。他为每一位男女先知都画了一座大理石围栏。意识到他们将在怎样的高度供人仰望，他使用了“仰视角”（di sotto in sù）透视画法来处理人物造型。

每个人物的位置也经过精心擘划：预言耶稣遭受苦难的耶利米在前端，预言耶稣复活的约拿在拱顶尽头的另一端；中间长长的两沿，五位先知与五位西比拉一一相对。这些人物都坐在宏伟的宝座上，展读着手抄本、书籍或卷轴。画在下方的牌匾写有他们的拉丁文名字。

几位先知的形象描绘得年轻有活力，有的则须发花白、满脸皱纹。无论男女，每位先知都有坚实的体态。他们身上的长袍造型饱满、色彩绚丽，展现出空间深度：画家以深厚的写实技巧描绘长袍随形体转动而拂动、卷曲或折叠时出现的阴影。

这些人物接收神启时显得警觉、担心，展读预言的姿态则富于动感。也许他们在为人类担忧，因为他们知悉将要发生什么事。他们左思右想，掂量、琢磨

着必须告诉人类的事情。他们在思忖神的启示时不无纠结。

米开朗基罗对人体结构精妙的把握，在利比亚女先知身上充分展现。一张粉笔画草图让我们一窥艺术家是如何描绘肌肉结构的。

“她在壁画上的复杂姿态，显然需要画大量素描来构思起草：那是她走下宝座时停顿的瞬间，手上展开的巨大预言书即将合起。”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分析文章写道。我们可以看到，当人物转过身来，优雅地伸出大脚趾让她保持着平衡。

画中人物也对声音有所回应，这从以西结身上可以看到。他仿佛意识到上帝在对他说话，抬起头向外望去。当他警觉地坐直身体，一阵看不见的微风拂动了他的斗篷。

每座围栏中的主体人物都不是孤身一人。画家在每位先知身边安排了两两位小天使（putti）辅佐，有的点燃蜡烛，有的举着手抄本。大理石围栏上方还有两个男体，米开朗基罗称之为“ignudi”（意大利语，意为裸体），但用意并不清楚。

这一项目让处于巅峰期、各方邀约不断的米开朗基罗殚精竭虑。传说他讲过：“我觉得自己像耶利米一样苍老又疲惫。那时我才37岁，却老得让朋友们都认不出了。”

在邪恶侵入人类生活最黑暗的时刻，先知们敦促人们拨正道德指针、拥抱美德，并且忏悔罪过。当先知发出危险的警言，要求人们改变自己时，他们确实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美国神学家尤金·H·毕德生（Eugene H. Peterson）这样说过：“先知的任务不是摆平事情，而是做对事情。”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等待解救人类于邪恶势力的天选之人。向善之人在仰望西斯廷礼拜堂天顶壁画那些恢宏的人物时可以安心，先知们传递给人的讯息是希望：美好的未来在前方。◇

原文：Sistine Ceiling's Prophets and Sibyls Ponder Heaven's Messag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古文里的大智慧 ——

张仲景《伤寒论》序言

文/高天韵

文以载道。中华古籍蕴藏着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治国韬略、礼乐之教、文学绘画、医药工艺、天象地理……多少宇宙与生命的奥妙就在其中。公元210年左右，东汉末年名医张仲景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巨著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确立了六经辩证论治的原则，受到历代医家、国外医学界的推崇，被称作“众方之宗、群方之祖”。

在六百多字的序言里，张仲景阐述了养生之道、医道与天道。在瘟疫流行之今日，品读此文，正当其时。

伤寒杂病论序

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欲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濛濛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产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

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序言开篇写道：我每次读到（史书中记载）秦越人在虢国为太子治病，在齐国见到齐侯的面色便知道他患病的事迹，没有一次不激动地赞叹他才艺突出。我对一个现象感到奇怪：当今社会上的读书人竟然不注重医药，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便于对上可以治疗国君和亲人的疾病，对下可以解救贫困者的病苦，而且能使自己长久健康，保养生命。（相反地）他们只是竞相追逐荣华权势，踮起脚仰望权贵豪门，只顾着追求名利；推崇、修饰对于自身最不重要的，却忽视、抛弃了根本，让自己的外表华丽，而使自己的内里憔悴。皮都不存在了，毛将依附于哪里呢？

张仲景从神医轶事谈起，继而分析他观察到的社会问题。文中批评的追名逐利、仰慕权势看似与疾病无关，但却是作者认为的养生保健之“本末”关键。对荣华的追求耗费了精力，导致个人修为的颓废，直至肉体的损毁。这种观点把健康与道德联系起来，阐明了物质（身体）与精神（品格）的一致性。

原文读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与白话解释对照，更显简洁。主要原因是文言多依靠单字表意（尤其是西汉之前），而现代汉语则是双字词居多。例如：“每览”意为“每次阅读”，二字变四字。再

有，词性活用也减少了字词的使用，例如：形容词用作动词，“怪”指“对……感到奇怪”，“华”指“使……变得华丽”。

另外，文言的词序灵活，可以烘托作者的情绪及语句的气势。例如，“惟名利是务”是一个典型的倒装句，正常顺序应为“惟务名利”（只追求名利）。“惟…是”结构将宾语前置，突出了中心词“名利”，正呼应其点评的“舍本逐末”之怪象。

文言文中有些字的字意与现代用法不同，例如“曾不留神医药”中的“曾”读作“zeng”，意思是“竟然”；“但竞逐荣势”里的“但”是“只管”的意思。

序言还写道：“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夫”是文言中常见的发语词，置于句首，作用

是发起议论，引领下文。此段大意是，大自然分布着五行之气，以此运转化生万物。人体禀承着五行之常气，才有五藏（心、肝、脾、肺、肾）的生理功能。经、络、府、俞，阴阳交会贯通，玄妙、隐晦、幽深、奥秘，变化难以穷尽，假如不是才学高超、见识精妙的人，怎么能探求到其中的道理和意趣。

这一部分将宇宙运行与人体的奥妙变化相比较、连通，喻示中国古代生命观及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正体原文“五藏”（音cang二声）在中国大陆的简体字变成了“五脏”，这一变异不仅窜改了中医“藏象”理论的意表，而且“脏”还可指“肮脏”，实在是扭曲了古文字的本意、正意。

一部《伤寒杂病论》救人无数，短小精悍之序言在千余年后依然光采四射。如今，面对乱世的乱象，人们常说：这个社会病了。何药可医？瘟疫突袭，人们惶恐不安，良方何在？其实，古代圣贤早已留下了济世、修身、养生的警训、道理和药方。传统文化可以为我们打开通向光明的大门。◇

一步之遥的清凉

文/青松

天气炎热，先生带孩子们去海边游泳戏水。我有事到办公室处理，说好晚些时候去找他们会合。

我在室内，一直开着空调。忙完后出门，感觉一阵热浪袭来。阳光刺眼，我撑着阳伞到海边，一眼看到孩子们在做游戏。他们在沙滩上建了城堡和水渠，然后用小桶从海里运水，倒进水渠里。

我撑伞站在岸边，热得一步都不想多走。我问孩子们热不热，要不要回家，他们都摇头，回说不热，当然也不肯走。孩子的童年需要父母的陪伴，我难得现在有空，所以不想错过。看他们忙碌而专注的样子，我知道他们正乐在其中，天气炎热与否并不相关。

空气被太阳烤热，呼吸似乎都困难。我知道下水能有效消暑，我离清凉可谓仅一步之遥。但今天出门时没打算下水，所以没带泳装。现在看着眼前的清凉

而无计可施，除非不顾一切把裙子弄湿，那麽回家路上又会麻烦。

想想感觉很有趣，水里与岸上虽然相隔那麽近，给人的感受却是天壤之别。我站在岸上，躲在阳伞的阴影里，依然热得眉头紧皱，懒得说话，懒得走路，只盼着下一秒能快快进到空调房里。孩子们在水里，尽情嬉戏，不觉热，没有抱怨，也不着急离开。

望着一步之遥的清凉，我深深体会到外人看不到的无奈。有些苦，我们注定要吃，如果硬躲，也许会失去更多。有些福，我们无法触及，如果硬享，会有代价。无论怎样抉择，没有完美无缺的路，我们需要寻得平衡，并无怨无悔地走下去。

最终，我选择站在岸边陪孩子。虽然需要忍受炎热，但可以不错过孩子们的快乐，内心是满足的……◇

建安神医董奉传奇

文/ 李翼云

浏览古代的医者列传，常会发现其中许多的医者也名列于《神仙传》中。“神医”与“神仙”经常是画上等号的。东汉末年，活跃于南方吴地的董奉，与华佗、张机（仲景）并称“建安三神医”。董奉修道有成，逐渐在南方的吴国留下神迹，足迹甚至到达与越南交界的交州。

董奉本是侯官县的修道人，四十多岁时，认识了当时还很年轻的县长。后来这人离开此地，五十年后路经侯官县，遂顺道拜访旧友，大家都垂垂老矣，只有董奉颜貌如故。他诧异地询问董奉：“你得道了吗？我昔日见你就是如此容貌，现在我头发都白了，你反而变年轻了，为什么呢？”董奉闻言含糊回答：“凑巧而已！”

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汉桓帝派遣本身就是交州子弟的士燮担任太守。士燮胸怀宽厚，谦虚下士，很多避难的中原人士前往依附他，而士燮本身喜爱治学，学问渊博，又把交州治理得很好，让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士燮家族雄踞偏远的交州，宛如帝王般，出入车驾威仪，兵马雄壮，让蛮夷十分震服，道路两旁常常有胡人烧香祝颂他。

然而，士燮一度暴病而死，也是他命不该绝，三天后，董奉来到他的棺木前，只见他将一颗药丸放入士燮的口中，倒了一点水进去，捧起他的头摇了几下，一会儿，士燮就张开眼睛，手也能动了，脸色渐渐恢复，半天之后，就能坐起来了，第四天就可以说话了。

士燮悠悠醒来后述说：“我当时死的时候，好像做梦一般，只见有十数个穿乌衣的人，把我带上车，送入一扇很大的朱红大门，关入一间只容一人的狱房中。”“然后用土从外面封住，密不透光。不久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要召士燮前往。』又听到外头铲土的声音，很久才将我带领出来。我看见一辆红色车盖的马车，车上有三人，一人拿著符节，呼叫我上车。快到门口的时候，我就活了过来。”他栩栩如生地描述这段死而复活的历程。

为了感谢董奉的救命之恩，士燮在庭园中盖了一栋楼屋服侍他。董奉不吃其他东西，只吃枣乾，喝一点酒。士燮每天供奉三次饮食。董奉每次来吃东西，就像鸟一样，腾空而来，吃完就飞走了，来来去去，都没人察觉。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董奉向士燮辞别，士燮泪流满面，但也留不住董奉。于是士燮问董奉要去哪里？要不要一艘大船？董奉说：“不用船，只要一口棺材。”士燮于是为他准备妥当，到了隔天中午，董奉就死了，士燮就把棺材埋了。七天之后，有人从外地来，转告说「董奉嘱咐代为谢谢士燮，要他好好照顾自己。」士燮大惊，赶紧打开董奉的棺木查看，发现里面只躺著一块丝绸。

董奉依然活跃人间，常有为民除害的事迹流传。一次，董奉路经浔阳城，得知东门通大桥下有蛟蛇为害百姓。董奉于是将符书沉入水中，几天后，人们就看见一条蛟蛇的尸体浮出水面。

在广州晋兴郡蚺蛇岭路边五十里的地方，经常出现长十几丈、巨大无比的生物，路过的人前去查看，往往一去不回。长年如此，因此失踪的人非常多。董奉离开交州后，恰巧经过此地，见状大惊说：「这是杆蛇。」于是他立即投宿旅舍，施以敕令。隔天去看，巨蛇已经死了，而周围白骨垒垒。

也不知过了多久，董奉回到豫章庐山下居住，每天替人治病，也不收钱。重病者痊愈后，只要种五棵杏树作为回报，轻症者只需种一棵。数年之后，总共种了万余株杏树，葱葱郁郁，蔚然成林。山中的百禽群兽都到杏林下戏耍踩踏，所以不生杂草，就像特别整理过似的。杏子熟成丰收后，董奉就在杏林中建造一间草房卖起杏子，并跟人们说：“想买杏子的人，不需要跟我说，只需将一箩筐的谷子自行换一箩筐的杏子。”当有人以少换多，林中的群虎就会出来怒吼赶人，人们吓得忙不迭地提篮飞奔而去，情急中跌倒，杏子掉了满地也不敢捡拾。往往到家一量，剩余的杏子就跟送去的谷子一样多。如果有人偷杏子，老

虎就会把他一直追赶到家咬死。家人赶快奉还杏子，叩头谢罪之后，那偷杏的人就又活过来了。

董奉每年卖杏买谷子，然后赈救贫人以及有急需的旅人，一年达二万余斛。董奉行善积德，在人间三百多年，容颜一直如三十余岁，一日跃入云中而

去，不复见踪迹。董奉种杏行医为善的故事流传至今，后人以“杏林春暖”颂扬良医之德。“杏林”遂成为中医行业的代称。

在道教的典籍资料中记载，董奉白日飞升，归位为“碧虚上监太一真人”。◇

突发突止的古希腊瘟疫



两千多年前爱琴海岸辉煌灿烂的雅典城，大瘟疫突然降临，得了怪病的人先是发烧、然后腹泻、浑身长满红包，四肢开始腐烂，人们能看见蛆虫在自己腐烂的伤口里钻来钻去。七八天，人便死去。

得病的人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当时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瘟疫做了详尽的记述：人们只知道死亡的人数在剧增，但找不出原因，也找不出制止的办法。尸体多的无人掩埋，连食人的鸟兽都因撕咬了尸体而死亡，家中的狗畜都不能幸免。

但让人不可捉摸的是，肆虐数年的大瘟疫，公元

前426年底以后，象是接到了无声的指令一般，突然间销声匿迹了。

雅典大瘟疫使辉煌璀璨的希腊文明迅速走向衰败。发病原因直到目前，学者们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后世的人们都认识到接近毁灭时的雅典人在道德层面有着非常败坏的劣迹，奢侈和浮华、乱伦、同性恋、暴戾与杀戮，几乎成为雅典人日夜狂欢的主要内容。

道德的沦丧或许是导致文明毁灭的深层原因，这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并引以为戒。◇

善良一念的力量有多大？

文/怀忍忍

人心中有一念，天地尽皆知吗？心存善念也起作用吗？善念能起多大作用呢？古人留下许多救世明鉴，留给我们一面面明亮的镜子，强大能量流转不灭。

逆转生死劫

这是清朝时发生在金陵的事情。有数十人一起渡江，船行到江心忽然刮起大风，一阵紧似一阵。紧急关头，忽然听到空中传来话语声，说：“黑额者！”

这船上的确有一个“黑额”的人。那人心想：“空中那些看不见的灵既然指名我了，我怎能连累众人呢？”于是他自行跳入江心。就在这一瞬间，船只也随即被大风翻覆了。

黑额跳下水后，有一漂木流到他身边，他抓附在漂木上随木飘至岸边，结果捡回一命。

人们知道他得以逃过死劫，都很惊异，非常不解，纷纷询问他平日是否积了德。

黑额说：“我生平也没作什么善事，只是常常提醒自己人的生命尽坏在一‘贪’字；所以只要我心中一起‘贪’念，便用‘推己及人之道’把它压下去，不该我得的，或额外的利益都不取。”

这位黑额在日常生活中，每一日都时时践履着“推己及人之道”，遇事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不就在修行吗？他能以“推己及人之道”不贪生怕死。在江上，他认命了，为他人着想之下，把自己的生命抛下了。这种坦然面对生死的胸怀已然不是凡人的境界了，结果反而让他置死地而后生。

化解夙世冤怨

有僧人在祠中修行，精洁自持，非常精进。当时有土贼到处行窃。一天晚上，僧人梦见神告诉他：“明日该当是你的死期。有贼乘白马来，名叫朱二，是你的宿世冤家，此业报不可避。”

僧人在梦中哀求：“念在某今生努力修善事，愿神明垂怜救护。”神回答：“我不能救你，只有靠你自救。”

次日天一亮，果然有贼入山，抓了僧人，问他财帛和妇女都在哪里，并胁迫僧人当引导带他们去搜寻。

僧人看来人乘的果然是白马，陡然想到：我受业报目下该当得死，如果还引导盗贼去掠夺财物、奸淫妇女，是业上加业啊！想到此，他大声对贼说道：“我不带你去，你不是朱二吗？我该当被你杀死，你可以杀我。”

来贼大惊，说：“你怎能知道我的名字？一定是神僧！”

僧人一五一十把梦中所遇告诉了他。来贼丢下木棒叹息道：“怨怨相报何时了？神说不救你，事实上神是在救你；你不给我带路，就是自救。我们把夙世冤怨都解了，有何不可？”

说完来贼向庙寺神像再拜而去。这一刻，一段夙世的冤怨在天地间化解了。

宁死不杀生

镇江军范某的妻子患肺癆濒临死亡。有一医生告诉范某说：“用麻雀一百只，磨成粉制成药丸，服用三十六天后，第三十七日服用雀脑，就会痊愈。切记，一只麻雀都不可少也。”

范某依照医生的指示开始去抓麻雀。妻子知道后非常生气，对他说：“为了我的一条命去残杀动物害百命；我宁愿死，也绝对不作这样的事。”

范某开笼把麻雀都放了。过没多久，范妻的病竟然自然痊愈了，而且怀了孕生下一男婴。孩子生下来时，两条手臂上带着黑斑，宛如麻雀的形状。◇

医学博士：养生之道 修真善忍

明慧记者/黄宇生

“《转法轮》是生命最宝贵的法宝。”王元甫医师，从一心研读西医学的理论，到因缘际会接触到法轮功，进而对中医产生兴趣。在阅读《转法轮》后，王元甫受到启发，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王元甫医师受到《转法轮》的启发，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王元甫是历任台南市立医院内科部、中医部主治医师，王元甫诊所、长欣诊所院长。目前他担任桃园市振兴诊所内科医师、八德阳德扶轮社2011-12年度社长、中坜明星扶轮社创社社长、国际扶轮3501地区2021-22年度地区总监、2011-12年桃园市市政顾问。他曾在二零零九年荣获中山医学大学杰出校友，二零一一年获颁桃园市社会贡献奖、二零一二年获赠教育部银质奖。其著作有《博士论文—三焦之文献与研究》、《身心灵健康—不吃药、不花钱的健康方法》。

同时拥有中山医学大学医学系医学士学位及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王元甫表示，西医和中医，两者本质差异很大；一个是实证医学，一个是神传医学。

一九八六年，王元甫自中山医学大学医学系毕业，行医之后，他发现西方医学的许多瓶颈，“例如高血压的病人要吃一辈子的药，失眠的病人要一直吃安眠药，不吃就睡不着等等。”王元甫认为这些疾病不能根治，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要去探求。

一九九七年，王元甫移居加拿大，在那里住了三年，本打算研读西医博士学位。二零零一年，王元甫有幸接触到法轮功，炼功中产生许多“气功现象”，“如开天目、手掌发出很强大的气流，小腹有东西在旋转……”这真实的感受令王元甫惊讶，他终于相信古老的气功是真实的，因此于南京中医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王元甫认为《转法轮》是一本天书。他说，自己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到中医的精华，完全是因为读《转法轮》的缘故。“《转法轮》书中提到古代的大医学家其实都有特异功能，因为他们都修炼。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对我后来完成博士论文有非常大的帮助。”他说：“因为《转法轮》把我们古代的中医有修炼的内涵，讲得很清楚。”所以，通过阅读《转法轮》，王元甫很容易了解到中医里很精华的内涵，写博士论文时很顺利，六个多月完成三十万余字博士论文，“如果没有《转法轮》的话，就没办法做到这么深入。”

人们常常谈“养生”，那么，什么是“养生之道”？

王元甫说，疾病很大一部份是精神引起的，《黄帝内经》提到，最好的养生之道是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就是要看淡名利、减少欲望、重视道德。“中医理论跟西医不一样，中医就是讲精、气、神，在具体方法上，‘养精’只要注意营养均衡就可以了，‘养气’最好的方法是练气功，‘养神’则需要重视道德；其中，炼气功与重视道德都不

用花钱，也不需要吃药，有非常神奇的功效。”

王元甫表示：练气功对养生保健很有帮助。他指出，一般的气功只是练气；更上一层就是修炼，那就要修心性。

他说，法轮大法修炼是性命双修，既要修命——炼功，也要修心性，按照真、善、忍的准则修炼。王元甫表示：“真、善、忍对我们的道德、精神、养生很关键。”在按照真、善、忍准则实修中，王元甫从常人亲友口中的好人，变成更好的人：“在修炼前，可能就是一个好人而已。但是修炼之后，就要符合大法的要求，做到真、善、忍。”他举例：“如果吃亏，我不会跟人家计较，因为要做到真、善、忍。”

他发现自己修炼后，“对很多事情能够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去看，很多小事情就不会去计较，例如你跟人之间的纠纷冲突，或是意见不同，很快就可以想通了，不会在上面坚持。”

王元甫表示，修炼后，对很多事情都能看淡，因为了解很多事情背后有因缘关系，“我遇到困难可能过两天，就忘记了，我很快就把它抛诸脑后。”

他还说：“修炼会开智开慧，依照真、善、忍的准则，很多你想不到的都会出现，很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做很多事情就会很成功。”

在行医看诊之余，王元甫也常举办公益讲座，告诉患者与大众：“修炼法轮功就能使人身心灵健康，同时也可以增进社会祥和，使人民健康、快乐。”他经常到学校、机关、社团、社区，甚至海外演讲，向与会者介绍令身心灵健康的方法。

“人终究会死，生命会结束，但是修炼就不一样。修炼就可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王元甫认为，“人来到世间就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使命，人生都有一个目标。”他表示，修炼法轮功后，他找到了人生的目标。◇

危难中的仁义

清朝顺治甲午年三月，在晋陵这个地方住着一个叫顾成的人，他的儿媳姓钱。一次在钱氏返回邻村娘家时，顾成所在的村子却发生了瘟疫，到处都有传染的情形，甚至连亲戚都不敢路过、不敢探访。不幸顾成夫妇也得了这种瘟疫，不久，几个儿子、媳妇等八人都陆续染病，整日卧病在床，奄奄一息。

钱氏得知公婆等人患瘟疫的消息后，急忙要赶回夫家照顾他们，可钱氏的双亲为了她的安全，极力劝阻，希望她不要回去。钱氏说：“丈夫当年娶我进

门，不就是为了能孝养年老的公婆吗？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我岂能置公婆于不顾呢？如果我明知他们病危而竟忍心不归，那我跟禽兽又有何异？我一定要回去照顾他们，就算死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她于是便赶了回去。

刚到家，就听到说话声。只听看不到的说话人说道：“众神都护着这个孝妇钱氏来了，我们速速回避吧！”没多久，顾成一家人果然都痊愈了。◇

轰动芬兰的一个轮回故事

文/马勤

1976年5月27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一个叫塔鲁·贾尔维（Taru Jarvi）的女孩出生了。她的父亲叫海基·贾尔维（Heikki Jarvi），母亲叫艾莉斯·桑德斯通（Iris Sundstrum）。塔鲁从1岁时就开始说话，一岁半时，她开始拒绝人家叫她塔鲁。她郑重其事的和大家说，要叫她贾斯卡（Jaska）。

贾斯卡是谁？是妈妈艾莉斯的第一任丈夫贾科·沃伦莱赫托（Jaako Vuorenlehto）的昵称。而贾科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艾莉斯和贾科很早就相识，贾科在18岁时对艾莉斯说：“有一天我一定要娶你。”可是后来的阴错阳差，使他们彻底失去了联系。到了1970年左右，命运注定了他们的突然重逢，并再次坠入爱河。此时已经40岁的贾科兑现了当初的承诺，把艾莉斯娶回了家。

贾科在婚前长期依赖酒精，婚后艾莉斯让他少喝酒，但当贾科酒瘾发作时，还是无法控制自己。1973年9月13日，结婚仅3年的贾科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回家，下车时，不慎突然摔倒在地，已经启动的公交车后轮碾过了他的胸部、脖子和头颅，导致他当场毙命。警方初步判定是他自己的失误造成的，或许是因为酗酒造成的，不过当时没有做酒精检测。贾科死时43岁，正值壮年。

在贾科去世一年多之后，遗孀艾莉斯嫁给了海基，也就是塔鲁的父亲。婚后一年，艾莉斯去了贾科的坟墓悼念他。在那儿，她听到一个声音，说贾科将在5月27日重回人世，并成为她的孩子。艾莉斯当时认为是自己幻听，根本没有在意。二婚的艾莉斯根本不想怀孕生子，因为她那年已经40岁了，不想高龄产子。

可是，艾莉斯居然在当年的10月无预期的怀孕了，更让她吃惊的是，在第二年的5月27日，真的是5月27日，她的女儿塔鲁呱呱坠地。

塔鲁在一岁半到五岁间，曾多次提及自己的前

世，也就是贾科的生活。对于贾科生前的东西，塔鲁很容易就可以认出来。有一次，塔鲁一边玩贾科的玩具车，一边说：“我曾经玩过它。”她还告诉妈妈，“她”曾经被公交车轧了过去。三岁半的一天，她对艾莉斯说：“你不是我的妈妈，你难道不知道我曾躺在车轮下死去？”“我为什么要选你做我的妈妈？”还有一次，塔鲁说道：“我被送到了医院，但那时我已经死了。”

因为前世车祸致死，塔鲁一直非常恐惧公交车、卡车和大型汽车。当她和妈妈一起走路时，如果有大型汽车经过，她一定要让妈妈将她抱起来。也许有人会说，小孩子个子小，看到大型车这样的庞然大物，害怕也是正常的。可是，塔鲁对大型车的恐惧感一直持续到她19岁。而且，塔鲁对每个月的13日都会莫名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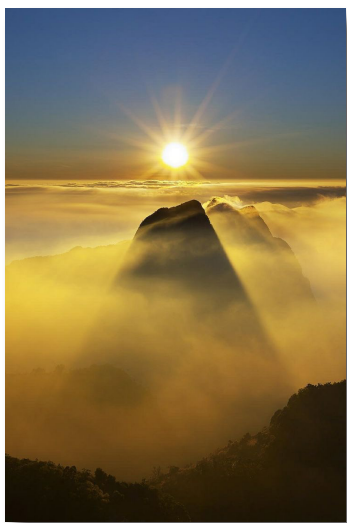
“前世记忆”现象研究先驱史蒂芬森教授在研究这个案例时表示，塔鲁的这些表现，很可能与她前世的死因有关，她是在9月13日被公交车压死了。因为有前世记忆，所以小小年纪的塔鲁曾说：“你不用害怕死亡，因为我已死过很多次。”“我曾有个妈妈在德国，叫森雅（Senya）。”她说的是自己另一次的生命轮回。

塔鲁从小对学习没有什么兴趣，15岁时就离开了学校，后来当了一名出租汽车司机。就是因为内心深处还留有上一世是男孩的记忆，她很少穿裙子，也从不穿任何有女孩装饰的衣服。随着时间的流逝，长大的塔鲁具有的回溯能力消失了，1998年，22岁的塔鲁与一个室内装潢师结了婚。她与父亲海基的关系也得到了缓解，并懂得去照顾他。

这个真实新闻再一次验证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今生的家人、朋友、仇人，都是往世恩怨的续集角色。若是想要有好的续集，那么从今天开始，改变自己，心存善念，是最有效的良方。◇

刚出生就能说话的婴儿

文/德惠



生命是轮回的，但绝大多数人在转世的时候都被抹去了前世的记忆。但也有极特殊的例外，有的人就带着前世的记忆转生。这样就出现了刚出生就能说话的婴儿。

一、进士庞澜之子

庞澜是任丘（今河北省任丘市）人，在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科举殿试中高中进士。他有个儿子，生下来就能说话。其刚出生就对父母家人说：我是浙江某地的某贡生，本来已经“赴京听选”，忽然感觉自己被人用小轿扛到这里。家人听后无不惊讶。

一日这个孩子被抱至大门前时，他忽然喊住门外路上的一个行人，说：这个行人就是我前世的街坊。这个行人也是惊骇诧异，俩人还对话，内容是其前世妻子的情况，以及“门舍、城郭、牌扁”等情形，说的全都对。这个孩子长到十岁时，对前世的情景就渐渐淡忘了。

原文《庞澜子》：庞澜，任丘人，中嘉靖己未

进士。生子甫能言，谓其家人曰：“我浙江某邑某贡生也。赴京听选，忽被人将小轿扛至于此。”家人惊异。一日抱至门前，见一人过而遽呼曰：“汝为我里中人某也。”其人骇愕。及询其妻子、门舍，城郭、牌扁，一一不差。后十岁始渐忘。

二、首辅夏言曾转生至陕西

夏言（公元1482—1548年），字“公谨”，号“桂洲”。明代高官、文学家。夏言为官以正直敢言而闻名，曾当过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累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其后被提拔为首辅大臣，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夏言所作诗文宏整，又以词曲擅名，有《桂洲集》传世。

夏言这个人非常刚直，得罪了很多人，因此他先后三次被嘉靖帝免职，三次被恢复职务，最后被严嵩等奸臣构陷，而被处死，成为明朝第一位被处死的内阁首辅。十九年后，嘉靖帝的儿子明穆宗为夏言平反昭雪，追谥“文愍”。

明代诗人丘坦（字“长孺”）曾说过这样一件事：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在夏言被押赴刑场处死之时，陕西一位平民家的妻子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孩子一出生就开口说话：我是首辅夏言夏桂洲，因何而至此啊？其家人听了他的话，无不惊骇莫明，不久这个孩子就夭折了。后来夏言被处死的消息传到陕西。这家人推算孩子出生的时间，正是夏言被处死的时候。原来夏言刚被冤杀就转生到他们家，大概因为带着前世的记忆，心中有太多不平就夭折了。

原文《夏相国》：元宰夏公桂洲，以谗受法东市。乃陕西一民家妇生子，甫落地即语曰：“我夏桂洲也，何以至此”其家共相骇诧，儿亦猝死。后考儿生之日，正公受法之时。丘长孺谈。◇（摘自正见网）

前生乱佛法，今世饥寒苦

文/太平

据《纂异记》，齐君房，家住在吴地。他自幼家境贫苦，虽然勤奋读书，但是能熟记的却很少。成年以后，也写一些文章，但没有清新之处。他受冻饿所驱，在吴楚一带找口饭吃。他经常拿一些自己创作的四五六七言诗句去谒见诸侯及贵族，但不被赏识。虽然偶尔也能换来几文钱，但从来没有积攒下银两。可是当他蓄满一钱袋，就必然患病。等到把积蓄的钱花光了，病也就好了。

元和初年，他在钱塘江漫游。正值灾荒年，官府却趁机搜刮钱财。因此，他投奔十人也遇不到一个接待他的，只好到天竺寺去讨早饭吃。有一天，他刚走到孤山寺西面，饥饿难忍，无法继续赶路，就坐在溪边面对流水哭泣，悲伤地呻吟。

过了一会，有个西方僧人从西面走来，也面对着流水坐下。然后转过头对齐君房笑着说：“法师，尝到秀才在外漂泊的滋味了吧？”齐君房答道：“漂泊的滋味已经尝够了，‘法师’这个称呼却从何而来。”

僧人说：“你不记得在洛中同德寺讲《法华经》的事情了吗？”齐君房说：“我活了四十五岁，只往返于吴楚之间，从来没有渡过长江，怎么会到过洛中呢？”

僧人说：“你现在正被饥饿所折磨，无暇回忆从前之事。”说着便伸手去口袋中摸出一枚拳头般大的红枣来，对齐君房说：“这为我国所产，吃下去可知过去未来事。”齐君房饿极了，从僧人手中把枣拿过来就吃了下去。吃完后，觉得口中干渴，就到溪边捧起泉水喝起来。喝完水后，打呵欠，伸懒腰，感到非常困倦，头枕着石头就睡着了。不一会儿，睡醒了。醒来后他忽然记起了在同德寺讲《法华经》一事，并

且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

于是他流着眼泪向僧人施礼问道：“震和尚如今在哪里？”僧人说：“修炼未成，再度到蜀地做和尚去了。现在已经断了向上爬的尘缘了。”齐君房又问：“神上人现在何处？”僧人回答说：“以前的心愿未能了结，听说又做法师了。”“悟法师在哪里？”回答说：“难道你不记得他在香山寺石像前，玩笑间许下的志愿吗？假若不能证悟到无上菩提的境界，就要成为有权势的将相，前不久听说他已经做了大将军了。当时我们一起云游的五个僧人，唯独我得了解脱，唯独你还是个受冻挨饿的人。”

齐君房流着泪说：“我四十多年来，每天只吃一顿饭，三十多年只有一件粗布衣服。早就想了断世俗之事。为什么不能功德圆满反而受难到现在呢？”僧人说：“你的过错发生在你教弟子的讲堂之上，你大讲异端邪说，歪曲佛经真义，使弟子们产生疑惑。虽然你讲经的声音浑厚响亮，但始终不能修成正果。你身斜影歪，所以得到如今的报应。”

齐君房又问：“如今我应该怎么办呢？”僧人说：“事到如今，我也无计可施。前世之事，希望能够对你有所警戒。”说着伸手到口袋中拿出一面镜子，镜子的背和面都晶莹剔透。僧人对齐君房说：“要知道贫贱的差别，苦乐的短长，佛法的兴替，佛门的盛衰，可从此镜中一览。”

齐君房拿过镜子仔细观看。过了很久道谢说：“报应之事，荣枯之理，我都知道了。”于是僧人将镜子收入袋中，准备离去。刚走出十多步远，便踪迹全无。这天晚上，齐君房到灵隐寺，剪发受戒，取法号为“镜空”。◇

进化论的三大证据相继破灭

进化论有三大经典证据：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胚胎发育的重演律，可是近年来的研究使得它们相继瓦解了。

比较解剖学，暴露了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

科学上，如果一个理论的证明违背逻辑，这个理论就不能成立，但是人们对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却没有深纠，也是因为深纠起来，就没有证据可言了。例如用比较解剖学来论证进化，形像地说就是：“如果人是猿进化来的，人和猿就会有許多相近的特徵；因为人和猿有許多近似之处，所以人就是猿进化来的。”懂逻辑的人都知道这种循环论证毫无意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证明”贯穿于进化论所有的证据之中。人云亦云，人们盲从地接受了它。

胚胎发育重演律，逻辑上不能立足，理论上禁不起推敲，事实上是一个观察错误。

19世纪，德国的海克尔提出了重演律学说，认为高等生物胚胎发育会重现该物种进化的过程。其实重演律本身就是假说，这个假设就成了进化论的重要证据：如果进化存在，胚胎发育的“重演现象”很像在反映进化的过程；因为有重演现象，进化就是存在的。这不但运用无意义的循环论证，而且掩盖了最关键的一点：谁也不明白“重演现象”和进化有什么关系，硬说成是因果关系。

其实，重演律是在生物学还很不发达的时候提出的假说，随着遗传学的出现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论失去了理论依据。既然过去的基因已经突变成新基因了，怎么还重现过去的特徵呢？就重演律本身，古生物学家古尔德也指出了该理论的致命缺陷，这些已是共识了。

现在，很多学者证明了重演律是一个观察错误。德国人类胚胎学家布莱赫施密特(Erich Blechschmidt)所著的《人的生命之始》(The

Beginnings of Human Life)一书中，以详尽的资料证明人的胎儿开始就都是人的结构，例如以前认为胎儿早期出现的象鱼一样的“鳃裂”，实际是胎儿脸上的皱褶，完全是人脸的结构，被硬说成“鳃裂”。胎儿在9毫米左右，身体下端的突起好像是尾巴，其实没有任何尾巴的结构特徵，那是一条中空的神经管，它发育较快，向阻力小的方向生长，暂时向末端突出，很快就平复了。而且它是有重要作用的，根本就不是遗迹器官。

对罕见的畸形病：毛孩和长尾巴的小孩，进化论认为那是人祖先的特徵；要按这么推理，没有大脑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没有大脑了？先天肢体残缺的、多长手指、脚趾的也常见，那么人的肢体就是从各种畸形进化来的？跳出进化论的思想框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的“返祖现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畸变的反映，和人类祖先联系在一起毫无道理。

古生物学上，至今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进化中的过渡类型

如果进化存在，必然存在进化过程中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否则进化就是谬论。在逻辑上，过渡类型的化石也就成了进化论的三大证据之一；而事实上，这方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用，达尔文等人猜想20世纪会找到明确的证据，也就是当时用“猜想”作了证据——这又是极不严肃的。事实又是怎样呢？直到现在，发掘出的化石不计其数，禁得起推敲和鉴定的证据还没有一例。

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寻找过渡物种“类猿人”，早就列入了科学的“十大悬案”。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40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直到1984年“嘉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茜也被大部份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

确定了露茜是一种绝种的猿，和人无关。

六具“始祖鸟化石”的相继问世，轰动了世界，成为鸟类和爬行动物之间过渡物种的典范。后来鉴定出5具是人造的，剩下的1具坚决拒绝任何鉴定。最初的“发现者”坦白了造假的原因之一：太信仰进化论了，就造出了最有力的证据。而教科书中，对始祖鸟和露茜还是不予更正，公众也就不知真相了。

假如进化存在，过渡类型化石就应该很容易找到，为什么没有呢？大家沿用达尔文的解释：化石记录不完全。深入一想：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随机的，为什么单单漏掉了过渡类型呢？

《审判达尔文》一书的作者约翰逊(Philip Johnson)做了这样的总结：“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某种有机体，没有逐步进化的任何痕迹……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哪怕过了几百万年，不管气候和环境如何变化，也不变了。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成立，这些条件本应该引起物种的巨大变化。”

古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埃德里奇曾根据地质历史的事实，提出了一个“间断平衡”假说，来说明过渡类型形成化石机率较小，但不能解释为什么过渡类型根本不存在，而且该假说的进化机制在基因水平上看，是绝对不可能的。◇

幸大莫过于为善 哀大莫过于为恶

文/ 山水

一九六三年，一位叫玛莉·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的夸奖，而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知捣蛋的戴维（她的弟弟）得到的却是一个甜饼。她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西勒·库斯特先生，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她在家和学校常看到一些像她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帝遗忘了？

西勒·库斯特是《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你说我说”栏目的主持人，十多年来，孩子们有关“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之类的来信，他收到不下千封。每当拆阅这样的信件，他心里就非常沉重，因为他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些提问。

一次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受牧师的启发，库斯特先生以《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为题，立即给玛莉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美国及欧洲一千多家报刊转载。以后每年儿童节他们都要再刊登一次，成为孩子们的最爱。

纯真的孩子，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价值观，做一个好孩子，希望得到夸奖和奖励，这是很自然的；主持人灵光一现，说出了“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这句话，其实是源自于其心灵深处对神的信仰，对普世价值的领悟；这句话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说明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对善良、真诚、宽容等美好品德的向往，对普世价值的认同。

一个故事

这是在中国大陆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酷的时期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二零零二年四月，几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在公安局的一个地下通道里。通道里暗暗的灯光，映衬着打手们狰狞的脸，他们一个个地询问法轮功学员的姓名，法轮功学员不配合他们，恶徒就从腰中抽出他们宽宽的皮带，向一个坐在墙边的年轻的男学员狠命地抡去。这时一位大姐扑了过去，双手抱住了男学员的头，皮带雨点般的打在了大姐的手臂上、头上。邪恶之徒一边抽打着，一边喊叫着：“走开！他是你的什么人？”

大姐正言制止说：“是我的弟弟，放下你的皮带，不然你会后悔的。”恶徒仍然挥舞着手中的皮带。这时，通道的尽头，那个很亮的地方，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他一边喊着“爸爸”，一边从裤兜里摸着什么食品塞到了嘴里，心满意足的咀嚼着……

抡着皮带的人停下了手，看着一次次正在一心一意斜歪着身子从裤兜的深处掏摸食物的儿子，狰狞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笑意。恶徒应了儿子一声，又摆着架势要抡起手中宽宽的皮带。大姐松开了护着学员的手臂，慢慢地站立起了身子，看着这个六七岁年龄的男孩。男孩依然在专心致志地掏摸着口袋，嘴里也依然心满意足的品味着。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漠视着眼前的残酷。

大姐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那个又要抡起皮带的年轻恶徒：“你把孩子带走！”恶徒一愣，随即得意地说：“放心，我们孩子是久经沙场的考验的，这种场面吓不着他。”

那一刻，大姐从内心为那对父子感到悲哀，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他说：“你把孩子带走！有一天，不久的将来，他知道你今天凶狠地、毫无人性地抡起皮带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们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唾弃你的，在他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的尊严！”

他怔怔地愣在那里，这时地下通道里一片寂静，他的同伙们也傻傻地呆看着他。过了片刻，他双手慢慢地平展开皮带，把它系在了腰上。他低着头，拎起了那只小小的手，向外走去。他走了几步，停了下

来，俯下身，用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着儿子说：“跟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

孩子回转过身来，扬起了小手，稚气地喊着：“谢谢阿姨，阿姨再见。”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目送着他们，他们将要走到楼的尽头的时候，那位刚刚放下皮带的年轻人挥舞着他的右手向着法轮功学员致意，然后，领着他的儿子走向地下通道那亮亮的出口处……

后来听人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打手，但从那以后，同单位的人没再见他挥舞过皮鞭。

即使是心狠手辣的打手，人性中也有对儿子的慈爱，也有对善的认同，也有对自己恶行的否定与悔过。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的善唤醒了打手埋在心底的善，让他停止行恶，与那些被中共洗脑依然没有清醒、依然在行恶的人相比，他无疑是幸运的。

没有哪个父母，希望自己寄以厚望的儿子，成为一个打人的凶手；没有哪个妻子，希望自己终身依靠的丈夫，是一个残暴的恶徒；没有哪个孩子，希望自己视为偶像的父亲，是一个迫害好人的恶人。当一个本应守护正义、主持公道的警察，沦为毫无人性、残害良善的暴徒，对他自己，以及至亲的亲人来说，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

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埋着一颗善良的种子，在生命的过程中，能守住这份善良，这个生命就是有希望的。◇



女教师一生节俭 百万遗产留给學生

文/王新



十多年前，当美国新泽西州杜特蒙镇的退休女教师维亚卡瓦（Genevieve Via Cava）对校长说，她要为学生们捐一百万美元时，校长特力加诺（Emanuele Triggiano）发出一阵大笑。“我以为她在开玩笑，……接着，我们拿到了支票。”

维亚卡瓦是一位特殊教育（针对存在视听障碍或患有自闭症等的学生提供的教育）教师，她在有生之年默默地攒下了一笔为数不小的财富，当她在2011年去世时，她决定将这些钱留给自己最希望帮助的人——她的学生们。

“她是一位心肠很好的人，虽然有时外表看起来很强势，但她的内心深处是充满了善良的，”维亚卡瓦遗嘱的执行人、她的好朋友嘉布隆斯基（Richard Jablonski）向NorthJersey新闻网站表示，“但是她笑起来时十分迷人。她是那种一走进屋子，笑容就把整个屋子照亮的女士。”

杜特蒙镇学区教育委员会（Dumont School District’s Board of Education）在今年收到了这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根据她的遗嘱，这笔钱将用来为有特教需要的学生提供初中以上教育的奖学金资助。

另一位好友肯尼迪（James Kennedy）介绍到，不

论过去多少年，维亚卡瓦总是能认出学生，并和他们聊天。此外，维亚卡瓦还会帮助那些已经毕业、20~30岁的学生们找工作，“她有着不可思议的记忆力，能记住很久之前发生的事。”肯尼迪现在是杜特蒙镇塞策尔学校的校长，他本人曾经也是维亚卡瓦的学生，七年级时曾上过她的英语课。肯尼迪说，“她有着很强的幽默感，她让学生感到轻松，总是很平易近人。”

除了帮助自己课堂上的学生，维亚卡瓦还会在课外项目中帮忙，辅导那些有特教需要的学生，帮助他们适应社会。

这么多年来，维亚卡瓦在尽心帮助学生的同时，还在努力地省钱，自己的生活十分节俭。

嘉布隆斯基认为，这可能于她小时候经历了美国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有关。维亚卡瓦年岁大了以后，渐渐开始听不清东西，但是她不愿意去买一个助听器。“大萧条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我总是问她，你到底在为什么而省钱？你明明可以买得起这些东西，这样你的生活会变得好过很多。”

直到维亚卡瓦去世后，嘉布隆斯基才知道，她是在为学生们而省钱，“留下了一笔永久的遗产。”◇

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七

前言

中共建政55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当今天的中国人在付出了六千万至八千万的无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后，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为什么要杀人？当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杀法轮功，甚至11月初还在汉源开枪镇压抗议民众的时候，许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会停止杀人，学会用嘴说话，而不是用枪说话。

毛泽东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说白了，就是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七、八年再杀一批人。

共产党杀人是有其理论根据和现实需要的。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建政后，它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份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六四”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这都是中共在强化其地位，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处理经济危机（建政后物价飞涨、文革后经济几乎崩溃）、政治危机（有人对党不服从，有人要和党分享政治权利）、信仰危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事件、法轮功事件）的过程中，采取的必然反应。除了法轮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是给中共邪灵充电、焕发革命斗志的过程，也是党的组织检阅，凡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党员都被淘汰出局。

同时共产党杀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共产党当年靠流氓无赖杀人起家。既然杀开了头儿，中间就绝不能停手，而必须不断制造恐怖，使人民在颤栗中接受对手过于强大而只能俯首称臣的现实。

从表面看，很多时候中共是“被动杀人”，好像是社会上的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触发了中共邪灵和中共组织的杀人机制。其实，掩藏在“偶然”后面的周期性杀人对中共来说又是一种必然，否则，“好了伤疤忘了疼”，过两年不杀人，人们就会产生中共已经改良的错觉，甚至像那些八九民运的理想青年一样扑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杀一次人，就可以不断刷新人们对恐怖的记忆，也可以警示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跟共产党作对，谁想挑战中共的绝对领导，谁想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谁就要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从这点来说，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慑民众。

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即使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并且在中共建政后什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

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也需要恐吓自己人，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怀和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东方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要爱人如己”。唯有共产党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借残酷镇压得以维系。

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杀人如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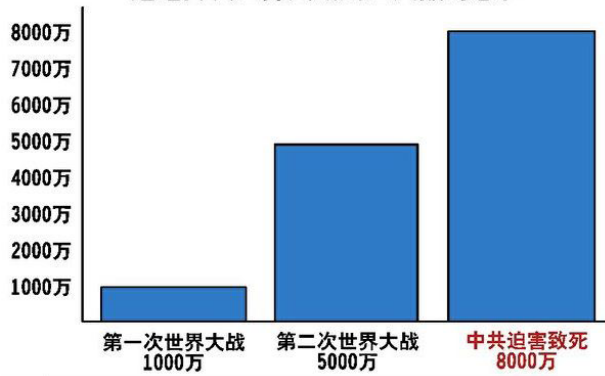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换句话说，早在中共进北京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实行“暴政”的决心，并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以下仅列举一些运动为例。

（一）镇反与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

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

1949年以后中共迫害致死的人数
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大纪元配图）

一道“圣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六十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

至于说被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借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

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分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当时村里

有些田地的都被定为“霸”，经常欺压百姓的叫“恶霸”；经常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叫“善霸”；什么也不做的叫“不霸”，这种划分并无实质区别，因为不论哪一“霸”的结局常常一样——当场处死。

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这种“镇反”和“土改”有几个最直接的功效：第一、过去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属于乡村宗族自治，乡绅成为地方的自治领袖，中共通过“镇反”和“土改”杀光了原有体系的管理人员，实现其“村村都有党支部”的农村全面控制；第二、通过土改和镇反抢劫大量钱财；第三、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慑百姓的效果。

（二）“三反”“五反”

如果说“镇反”和“土改”主要针对农村基层的话，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城市中的屠杀运动。

“三反”是从1951年12月开始的针对中共内部干部腐化而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时也处决了腐败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都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一月开始“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千余人被牵

连，5百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万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三）大饥荒

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实际上海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3千万到4千5百万之间。

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争放卫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诬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

贺亦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得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驯乐区委为了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

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祸首，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伟光正”。

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借口拒绝了。

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中共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党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四）从文革、“六四”到法轮功

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

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著名的知识份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口（日含）、储安平等都是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

文革时期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对“阶级敌人”的虐杀就极其残酷和野蛮。

“改革开放”却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海外很多记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并将坦克追着将学生压成肉酱的屠城录像在海外电视台播出。

十年之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镇压法轮功。到2002年年底的时候，大陆的内部消息即指有超过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杀7个人。

如今的中共似乎杀人数量远远不像过去庞大得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但是实际上这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人民被中共的党文化异化得更加犬儒；另一个是中共由于巨额贪污和盗用国库已经造成“输血型”经济，外资成为维持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对“六四”之后的经济制裁记忆犹新，深知此时明目张胆地杀人会导致外资撤离，从而危及其统治。但是中共背地里却没有停手，只是在极力掩盖血污。

二、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权力和维持权力。而杀人就成了其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方法越残忍、人数越众多，才越能够恐吓人民，而且这种恐吓是早在抗战时期甚至以前就开始的。

（一）抗战期间在华北的暴行

美国总统胡佛向全世界推荐雷震远神父的著作《内在的敌人》时说“在这本书里揭露出共产主义在

行动上赤裸裸的恐怖真象。我愿向那些希望切实明了弥漫在全世界上的这个魔鬼势力的全国人士们，推荐这本书。”

雷震远神父在书中讲述了一些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吓民众的故事。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广场上去，小孩子们则由他们的老师领着，目的是让他们观看 13 个爱国青年是如何被砍头的。在宣读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后，中共命令已经吓得脸色发白的教师领着小孩子们高唱爱国歌曲。在歌声中出场的不是舞蹈演员，而是一个手持钢刀的刽子手。“刽子手是一个凶狠结实的年轻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底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刽子手连续挥动了 13 次钢刀，砍下了 13 颗人头，随后中共的士兵们一起动手，对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这一切暴行都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从此之后，雷神父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他们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中获得刺激的快感。

当中共觉得杀人已经不够恐怖刺激的时候，他们开始发明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强迫人吞食大量食盐却不给一点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为止，或者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或者在冬天冰冻的河上打洞，把犯人从洞口抛下，直到冻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定购了几只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脱光挪进锅里，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至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号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

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了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二）“红八月”红色恐怖和广西吃人事件

中共在打下江山后，丝毫无意收敛暴行，文革时这样的暴行被进一步发展放大。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后，就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风风火火的“武斗”随即在全国展开，这些中共用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则，以其疯狂、愚昧和无法无天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打人、抄家活动。很多地方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采取“连根拔”的灭绝政策，大兴县尤为典型，从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县内 13 个公社，48 个大队，先后杀害了 325 人，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才 38 天，有 22 户人家被杀绝。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

比大兴屠杀更野蛮的是广西吃人事件。郑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 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

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

2. 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3. 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吃人的宴会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中共作为一个极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深入每一个社会细胞，没有中共在背后怂恿和操纵，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中共常常给自己唱赞歌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而这一场场的人肉盛宴却折射出：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

（三）迫害法轮功

当中国人也开始步入电脑时代、宇航时代，也可以私下谈论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又极度恶心的暴行已经过去，中共也披上文明的外衣要和世界接轨了。

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当中共发现有这么一个团体

不惧于它们的酷刑和虐杀时，所使用的手段就更加疯狂，而这个受到迫害的团体就是法轮功。

如果说，红卫兵的武斗和广西的吃人还是以消灭对方的肉体为目的，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就结果一条人命的话，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目的却是要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且残忍酷刑常常持续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估计已有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因此而失去生命。

法轮功的修炼者历尽九死一生记录下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超过百种酷刑，以下仅举几例：

毒打是虐待法轮功学员最经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牢头直接打学员，也唆使犯人毒打学员。有的学员耳朵被打聋，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齿被打断、打掉。头骨、脊椎、胸骨、锁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断和截肢的。还有用劲狠捏男学员的睾丸，狠踢女学员阴部。学员不屈服就接着再用刑，被打得皮开肉绽、面目皆非、严重变形的血淋淋的人，还要被用盐水浇身、用高压电棍电，血腥味与肉糊味相混，惨叫声撕心裂肺。在暴打的同时用塑料袋套住被打者的头，试图让后者在窒息的恐怖中屈服。

电刑也是中国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最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用电棍电学员的敏感部位，口腔、头顶、前胸、阴部、乳房、臀部、大腿、脚底，有的到处乱电，用多根电棍电，直至有烧焦烧糊，糊味到处能闻到，伤处紫黑。有时头顶与肛门同时过电。警察经常使用10根或更多电棍同时施暴，一般的电棍几万伏。连续放电时，发出蓝光，伴随着刺耳的啪啪声。电在人身上就像火烧一样，又像被蛇咬。每放一下，就像被蛇咬一口一样痛。被电过的皮肤会变红、破损、被烧焦、流脓等。更高功率和电压的电棍更加凶猛，电在头上就如同用锤子砸头一样。

用烟头烧手、脸、脚底、胸、背、乳头等，用打火机烧手，烧阴毛，将铁条在电炉上烧红后，压在双腿上烙烫，用烧红的煤烙学员的脸，把备受酷刑折磨后还有呼吸心跳的学员活活烧死，对外称其为“自焚”。

专门毒打女学员的前胸及乳房、下身；“强奸”，“轮奸”，用电棍电乳房和阴部。用打火机烧

乳头，用电棍插入阴道。将4把牙刷捆绑一起，插入女学员阴道用手搓转。用火钩钩女学员的阴部。女学员被双手反铐，用电线把其两个乳头穿一起过电。把女学员剥光衣服后投入男牢房，任男性犯人污辱。

将“恐怖约束衣”给法轮功学员穿上，将学员手臂拉至后背双臂交叉绑住，然后再将双臂过肩拉至胸前，再绑住双腿，腾空吊在铁窗上，耳朵里塞上耳机不停地播放诬蔑法轮功之词，嘴里再用布塞住。一用此刑者，双臂立即残废，首先是从肩、肘、腕处筋断骨裂，用刑时间长者，背骨全断裂，被活活痛死。

还有将学员浸泡在污水或粪水中，谓之“水牢”。其它折磨还包括竹签钉指甲，住天棚、地板和墙上长满红、绿、黄、白等长毛的房间，用狼狗、毒蛇和蝎子咬，注射摧毁神经的药物，以及其他种种千奇百怪的折磨。

三、党内残酷斗争

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其党员、尤其是高干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心就成了问题。因此，在党内也需要杀人，也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让活下来的人看到当最高独裁者要搞死谁的话，这个人会死得多么惨。

因此共产党的内斗十分出名。俄共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当时五名元帅中毙了3个，五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毙了3个，全部二级集团军司令10个人全部枪毙，85个军长中毙了57个，195名师长中毙了110个。

中共也一向鼓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斗争杀人不仅仅针对党外，早在江西的时候中共就开始杀AB团，最后杀得几乎没有多少会打仗的；在延安的时候搞整风；建政之后收拾高岗、饶漱石、胡风、彭德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内部的老家伙们几乎收拾一空。中共的历任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刘少奇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曾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就是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下走完一生的。在他7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刘少奇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由于他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疼痛难忍。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临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

到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少奇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党可以将堂堂国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四、输出革命，海外杀人

中共除了在国内、党内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之外，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红色高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这里暂不讨论红色高棉的累累罪行，但却不得不说一说它和中共的关系。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三个月，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据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

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八万人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王贤根着《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

这里仅举一例，西哈努克国王的两个儿子被柬共杀害后，周恩来一句话，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柬共在杀人的时候是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的，免得养虎贻患。而对周恩来的要求，波尔布特二话不敢说就执行了。

周恩来一句话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对于柬共屠杀二十多万华人，中共却抗议一声都没有，当时华人去中国大使馆求救，使馆竟然坐视不理。

1998年5月发生的印尼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声，不但不予救助，反而在国内拚命封锁消息。似乎海外华人死活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连人道主义援助都不予提供。

五、家庭的毁灭

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了多少人，我们已经无法拿出准确的统计数字。民间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语言的间隔根本无法统计；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进行这种自掘坟墓式的统计。因此，中共永远对待自身的历史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做法。

对于中共戕害的家庭数量就更难获得。有的是一个人死了，一个家庭就破坏了。有的是一家一家绝。即使没有死人，但被强迫离婚的、父子女女被迫划清界限的，将人致残、逼疯的，将人折磨出重病而过早谢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剧，相关的统计数字就更加匮乏。

按照日本读卖新闻的报导，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那么中共毁坏的家庭估计至少有上亿个了。

关于张志新的报告文学把她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都知道她受尽酷刑、轮奸和精神摧残，最后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被割断喉管后枪决。

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场悲剧的背后还有更为残忍的故事——“死囚家属学习班”。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回忆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经历：“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某大学一位教师有着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时他的家庭却遭受了一场灾难。他的妻子在反右时正谈恋爱，恋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边远地带，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轻的姑娘无法舍身相伴，嫁作他人妻。当早年的恋人历经苦难终于回到家乡，已是几个孩子母亲的她无法忏悔过去的无情和背叛，执意要和现在的丈夫离婚，重新赎回良心的罪责。突然的变异使她的丈夫——这位50多岁的大学教师无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脱光了衣服在露天里到处寻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终妻子还是离开了他和孩子。党设下的痛苦剥离是无解的方程，是以这个撕裂取代另一个撕裂的社会不治之症。

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文化对党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对于家庭的破坏是中

共杀人史上尤为残暴的劣迹。

中共由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当一个人被划为专政对象的时候，马上面临着生活的危机，和社会上的千夫所指，尊严的被剥夺。这些人又从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么家庭就成了他们获得安慰唯一的避风港。但是中共的株连政策却使家庭成员无法互相安慰，否则家人也就成了专政的对象。张志新就是被迫离婚的。而对更多的人来说，亲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发和批斗，常常是压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这样走上了绝路。

六、杀人模式及后果

（一）共产党杀人的理论指导

共产党常常吹捧自己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集古今中外一切之邪恶。它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知识份子，用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贩卖彻底的无神论，用共产主义否定私有制，又用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实践统治国家，同时又结合并进一步恶化了中国文化中背离传统的最恶部分。

中共用它发明的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框架模式来改造世界，保证其一党独裁。其理论分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分。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要巩固上层建筑，特别是党的政权，必须首先从经济基础进行革命。这其中包括：

1. 杀地主解决农村生产关系。
2. 杀资本家解决城市生产关系。

在上层建筑层面，杀人也在反复进行，为的是保障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垄断。其中包括：

1. 解决知识份子对党的政治态度问题

中共长期以来多次发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超政治观点、超阶级思想，自由主义等等，洗脑诛心，令知识份子斯文扫地，一些在知识份子中的自由思想和优良品格，包括仗义执言，舍身取义，“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达则兼善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几乎荡涤殆尽。

2. 为中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权而发动文革杀人

先是从党内到党外发动群众运动，从文学、艺术、戏剧、历史、教育等领域杀起。先是全国人民杀几个人，如“三家村”、刘少奇、吴□(日含)、老舍、翦伯赞等，发展到杀“党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再发展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互相杀戮。武斗消灭肉体，文斗消灭灵魂。那是党操纵下的一个混乱和极度暴烈的时期，人性中恶的方面被党的危机充电需要放大到最大限度。每个人都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在“捍卫党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名义下任意杀人。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灭绝人性的全民操练。

3. 为解决文革后社会上的民主呼声，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

这是军队首次公开杀人民，为了压制人民反贪污、反官商勾结、反腐败的呼声，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呼声。为了达到军队相互钳制和军队仇恨群众的效果，中共利用甚至布置了烧军车、士兵被杀死的场面，制造人民子弟兵屠杀群众的惨案。

4. 屠杀不同信仰的人

信仰领域是中共的命根子。为了中共的歪理邪说能够欺骗一时，中共在建政初期就开始消灭会道门和各种信仰体系。而面对新时期的精神信仰——法轮功群众，中共再次祭起屠刀。其策略是利用法轮功修炼“真善忍”，“不会放毒”，“不搞暴乱”，“不会造成社会不安定”来取得镇压经验，进而消灭其他一切信仰群体。这一次是中共党魁江泽民亲自跳到前台杀人。

5. 为掩盖消息而杀人

控制民众的知情权是中共手里的另一张王牌，中共也为封锁消息而杀人。过去“偷听敌台”就是坐牢的罪名，现在面对各种电视真相插播，江泽民下达

了“杀无赦”的密令，插播真相的刘成军就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中共利用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警察、公、检、法和庞大的网络警察系统，监测群众的一举一动。

6. 为私利剥夺百姓生存权

共产党的继续革命论，其实就是不能放弃领导权的问题。在现阶段，中共的贪污腐败，已经发展成为党的绝对领导权与老百姓的生存权的冲突，当民众起来在法律范围内维权时，又见共产党动用暴力，不断对“为首分子”舞动屠刀。中共为此已经准备了超过一百万的武装警察，比起六四时临时调动野战军来，今日的中共更加做好了杀人的准备。而当民众被逼上绝路的同时，中共也在将自己逼上绝路，其政权到了草木皆兵、风雨飘摇的程度。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邪灵，为了它的绝对控制权，不管在一时一地表现有什么变化，它过去杀人，现在杀人，将来还会杀人的历史不会改变。

（二）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杀人模式

1. 舆论先行

中共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杀人方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模式。绝大多数的杀人都是“舆论先行”。共产党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倒好像是共产党应老百姓的要求杀人一样，实际上，“民愤”却是中共煽动起来的。

比如戏剧《白毛女》就完全是在篡改民间的传说故事，《刘文彩》的收租院和水牢也是编出来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去痛恨地主。这种妖魔化“敌人”的做法历来都用，连国家主席也可以妖魔化。对法轮功更是通过伪造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来挑动仇恨，而后对法轮功民众施以群体灭绝式的迫害。这种杀人模式，共产党不但没有改，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用越登峰造极，过去是骗中国人，现在连外国人一起骗。

2. 发动群众杀人

共产党不但自己通过专政机器杀人，还“放手发动群众”杀人。如果说开头还有一点规章法律的

话，待到群众杀得兴起时就毫无节制了。例如“土改运动”中，一个土改委员会就能决定地主分子的生死。

3. 先杀灵魂，再杀肉体

杀人的另一个模式是“先杀灵魂，再杀肉体”。历史上最残暴的秦王朝也没有出现过精神屠杀，而中共却绝不给人慷慨就义的机会。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样没有任何尊严地去死，否则慷慨赴死的气概会激励来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耻，才达到了中共“教育”后来人的目的。中共现在迫害法轮功极其残暴的原因就是法轮功把信仰看得重于生命，在无法摧毁他们的尊严时，中共便竭尽所能地折磨他们的肉体。

4. 有打有拉地杀人

在杀人的过程中，中共会“胡萝卜加大棒”一起用，有打有拉。它从来都是说“打击一小撮”，或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好的，永远是“教育”的对象。这种教育分为“恐怖”与“温暖”两种。“恐怖”，就是让人看到与共产党对立绝没有好下场，对被打击的人要避而远之。“温暖”，就是让人们看到如果能得到党的信任，与党站在一起，不仅安全，还可以得到重用，甚至分吃一点人血馒头。林彪说“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每每那些庆幸躲过了一次运动的人会成为另一次运动的牺牲品。

5. “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

如今，中共还发展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比如各地工潮、农民抗争越来越多见，中共本着“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原则，每每把“首要分子”抓起来，判以重刑。再如，在人权自由越来越成为世界共识和潮流的今天，中共不判处一个法轮功学员死刑，可是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的教唆纵容下，各地普遍出现酷刑致死法轮功学员的惨案。又如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上访权利，但是中共使用便衣警察，甚至雇佣地痞流氓，搞“截访”，抓人、遣送、甚至劳教民间上访的维权民众。

6. 杀鸡儆猴式的杀人

迫害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等。

7. 用不杀人来掩盖杀人

国际上有影响的人往往中共只镇压而不屠杀，目的是为了暗中杀那些影响力小的。比如镇反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如龙云、傅作义、杜聿明等倒是没有杀，杀的都是国民党的中下级官员和士兵。

长期以来的杀人异化了人的灵魂，现在中国许多人的杀心都很重。“九一一”事件时，大陆网站上竟然一片叫好之声，鼓吹“超限战”的说法也不绝于耳，这实在让人思之不寒而栗。

结语

由于中共的消息封锁，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在其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以上列举的各个运动就至少致死了6千万人，此外还有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等地对少数民族的屠杀，相关史料就更难找到。《华盛顿邮报》则估计中共迫害死的人数达8千万之多。

除了致死之外，还有多少人被致残，多少人得了精神病，多少人被气死、吓死、郁郁而终，我们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死亡，对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悲剧。

日本读卖新闻曾经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统计，整个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占中国人口的一半左右。

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字。李井泉在听到别人告诉他四川省饿死了许多人的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哪个朝代不死人？”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所以斯大林迫害死2千万人，占前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迫害死8千万，也差不多十分之一；红色高棉迫害死200万，占其人口的四分之一；现在北朝鲜饿死的人估计也超过100万了，这都是共产党欠下的血债。

邪教用杀人来血祭其供奉的邪灵，共产党从出现

开始也不断用杀人、甚至是杀不了外面的人就杀自己人的做法来祭祀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邪说，乃至把自己的总书记、元帅、将军、部长等等摆上其邪教的祭坛。

许多人认为应该给中共时间让它变好，并说它现在杀人已经很有节制了。且不说杀一个人也是杀人犯，从更大层面来说，因为杀人是中共达到恐怖统治的手段之一，那么，杀多杀少就是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的。其表现可以概括成“不可预测性”。在人们的恐怖感不大时，多杀一些人就能提高恐怖；在人们的恐怖感很大时，杀少量的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不由自主地害怕时，中共只是嚷嚷杀人（不用杀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经历了无数的政治杀人运动，对中共的恐怖形成条件反射之时，中共可以提都不提杀人。宣传机构的大批判调子就足以唤回人对恐怖的回忆。

一旦社会上人们对恐怖的感受有变化，中共就会调整它的杀人力度。所以，中共杀多杀少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其杀人的一贯性。中共并没有温和，更没有放下屠刀，而是人民被奴化了。一旦人民起来要求什么，超出了中共的容忍，中共是绝不会犹豫和客气的。

也正因为要维持恐怖，随机性的杀人是维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于历次大规模杀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确运动对象、定罪和量刑标准，为避免被划进可能被杀的范围，人民往往退缩到一个自我划定的相对“安全”区，这个区域有时比共产党划的还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人人都是“宁左勿右”，每次运动都是“扩大化”，是因为一级一级的主动加码以求自保。运动越往下越残酷，这种全社会的恐怖自动放大效应就来源于共产党的随机屠杀。

在长期杀人的历史中，中共演变成一个变态系列杀人狂。通过杀人来满足其大权在握、生杀予夺的变态快感；通过杀人来缓解内心的恐惧；通过不断杀人来压制以前杀人所造成的社会冤仇和不满。时至今日，中共由于血债累累，已无善解的出路，而又依靠高压与专制维持到它生存的最后时刻。即使有时采用“杀人，平反”的模式来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将来就更不可能改变。◇

无辜还是万恶

文/ 陆文

艾希曼是德国纳粹时期保安总部第四局的课长。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去死亡集中营，曾经在四个月中，组织运送了七十多万犹太人。

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成功地追捕了逃亡的艾希曼。而艾希曼认为自己仅是一个“无辜的人”，在法庭上他死不认罪。全世界都认为他是“杀人恶魔”，双手沾满鲜血，他罪该万死。

艾希曼认为自己无辜的理由是：作为公民，他忠于自己的祖国，遵从国家的法律。作为军人，他服从领袖的指挥，执行上级的命令。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办公室里接受文件，统计数字，安排车次等等。他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也没有人在他面前血肉横飞。“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因此，他认为没有罪责。

全世界的人认为艾希曼罪恶的理由是：他承认自己知道“总统命令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他头脑清醒、理智健全，他知道自己运输的工作，是置犹太人于死地的一部分。正是在他的指挥组织下，几百万人乘上火车，就从自由人到囚徒、从毒气室到惨死。尽管他没有直接杀人，但参与了杀人，他必须付出代价。最终，艾希曼被执行绞刑。

在有迫害的地方，就会有施暴者与受害者。悲惨的历史，并没有终结，只是换了时间地点与人物。“艾希曼”们转生到了中国，而法轮功修炼者成为了被害的羔羊。

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在中共迫害体制中，法官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完全不以法律为准绳，根本不依法判决，而是依据上级的授意，下达迫害的判决。这样一来，数以万计的无辜修炼者被判刑，深陷囹圄的修炼者有的遭受酷刑折磨、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活摘人体器官。

二零零二年，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院张海涛曾冤判二十一名法轮功学员入狱，其中法轮功学员王立文和秦月明都被非法判刑十年。

二零一一年二月，佳木斯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执行强制严管和暴力转化，在短短十五天内，秦月明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秦月明遗体被放到冰柜里，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口鼻流血，面目表情痛苦异常，他的右侧脖子后部呈大片红肿。

江西南昌青云谱法院副庭长陈水根，诬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十一年，张淑君十年等，致使两位法轮功学员身陷囹圄、妻离子散。

在张海涛、陈水根看来：他们只是中共的工具，为了挣工资，必须执行中共的授意，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也“没有罪责”。他们只是“例行公事”，下达了判决，他们甚至没有打骂修炼者一下，他们不得已而为之，他们没有故意伤害，他们是清白无辜的。

在天理道义人权看来：就是他们签字的一纸判决，把善良守法的修炼者送进监牢。而秦月明遭受的酷刑，陈向阳等的被折磨，与法官的诬判有因果关联。没有冤判，就没有下狱；没有下狱，就没有惨死。张海涛、陈水根他们没有用手杀人，他们用的是职权，他们也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朗朗乾坤，皓皓日月，岂能无法无天！岂容恶贯满盈！中国古语讲：“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尽管艾希曼极力撒谎、掩饰、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还是被处以极刑。尽管张海涛、陈水根可能理直气壮，他们的末日还是来到了。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一日，张海涛和别人出去吃饭，坐在车里正说话时，突然就不说话了，别人赶紧给他送医院，结果心梗猝死在医院。陈水根在诬判陈向阳、张淑君等后，不到一个月，在另一场庭审休庭时，他突然脑干出血，暴死，终年五十岁。

正义还是邪恶，不是由国家、法律决定的，是由天理决定的。无辜还是万恶，不是由领导、组织界定的，是由道义审判的。以法律的名义为自己免责，以上级的命令为自己开脱，都是异想天开的自圆其说，也是可悲可笑的自欺自毁。

今天如果你参与迫害，将来你必须只身一人负全责。迫害佛法，就是斗法，迫害大法徒，就是害佛，斗法毁佛，必将是以卵击石的下场。

无辜还是万恶，请你自思自虑，请你善待他人，请你珍重自己。◇

“认命”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

文/平凡

一天，和妻子谈起当今家庭不和的原因，妻子说：“家庭不和是因为彼此都不认命，都在向外找出路，带来了各种道德乱象。”这句话引起了我对“认命”的思考。

传统文化讲认命，不讲争斗。从传统文化典籍中看古人的生活状态，“认命”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古人认的是“天命”，认的是宇宙规律，按照天理行事，明白善恶有报是天理，遇到善恶是非选择面前，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怎么会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呢？

宋朝姚时可当狱吏的时候，宰相张邦昌的族弟张某因结党谋逆的罪名被逮捕。张某与他的家人都被捕入狱。自觉难逃一死命运的张某有一天对姚时说：“我估计我将必死无疑，我有一些金子藏在一个暗室中，你可以取出来，然后烦请你悄悄帮我买份毒药。待朝廷判决书下来，我即与家属一同自尽。至于后事也一并托付给你了。”

姚时可安慰他说：“当今朝廷广施仁政，讼

狱多会被宽大处理。我先为您探听消息。如果确实罪不可免，先生再行此计，也为时不晚啊。”

后来，张某经查“没有参与谋逆”，被无罪释放。张某非常感谢姚时可保全了他的一家人，要赠予他一百两银子。姚时可拒不接受。当时姚时可还没有儿子，这件事之后，他一连生了八个儿子，皆有才名，相继在科考中登第，后来都成了名士。

姚时可不乘人之危，选择了善，积了善德，从而改变命运，八字登科，福报可谓深厚矣！

“认命”并不是今天人理解的什么也不用做了，就等着好运、厄运临头吧，不是这个意思。人在人中还有基本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各种活动，有着各种的人际交往，人不可能孤家寡人一个，与世隔绝。“认命”是我相信命中注定、善恶有报的天理，相信因果报应，行善能得福报，作恶会遭受恶报，在善恶的选择面前，我要选择善念善行，得到神佛的加持，让生命获得更加美好的未来。◇

苏轼逆境中的豁达：

也无风雨也无晴

文/新生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字子瞻，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宋仁宗年号，1056~1063）进士。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的“乌台诗案”，苏轼遭构陷下御史台狱被轮番鞠讯，并囚于狱中折磨达一百三十天之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此次文字狱遭构陷牵连七十余人，平日与苏轼往来者有29人亦遭处分。据称，面对此一大人生困境，苏东坡被押解至太湖时，他曾经想过跳水自杀，但几经挣扎，最终没有成功。

在黄州城两年后（公元1082年）的春天，三月七日，苏轼与朋友出游沙湖，风雨忽至，朋友深感狼狈，词人却毫不在乎，泰然处之，“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写下了《定风波》这首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景，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上片着眼于雨中，下片着眼于雨后，全词体现出一个正直文人在坎坷人生中力求解脱之道，篇幅虽短，但意境深邃，内蕴丰富，诠释着作者的人生信念，展现着作者的精神追求。字里行间透露着面对逆境、磨难时，心中那种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

词人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全词即景生情，语言诙谐。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

“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

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

结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

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句中“萧瑟”二字，意谓风雨之声，与上片“穿林打叶声”相应和。“风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指野外途中所遇风雨，又暗指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从诗词中，人们看到了他的境界转折，跨越了苦难，迈向了更加通透、旷达的人生境界。◇

找到幸福

文/宝蓝

有一天，一位衣着华贵的贵妇去看心理医生，说自己生活的并不幸福快乐，活的空虚且又无聊。

于是，医生招呼清洁地板的老妇人过来，对着有钱的贵妇说：“让玛丽告诉你，她是如何找到幸福的吧，你好好听她讲吧。”

老妇人放下扫把，坐在椅子上，开始讲她的故事：

“我先生得疟疾死了。三个月后，唯一的儿子被车撞死了。我没有其他亲人，一无所有，睡不着，吃不下饭，对谁也笑不出来，甚至我还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一只小猫跟着我。我有点可怜它，看到外面那么冷，我就让它进屋，给它牛奶喝。一会儿，它把盘子都舔干净了，满意地低

声叫着，蹭着我的腿。”

“就这样，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笑了。然后我就想，帮到一只小猫都能让我微笑，那为其他人做事，也应该让我会更幸福吧！”

“第二天我烤了饼干，带给卧病在床的邻居。之后每天，我都努力为别人做些好事，看到他们高兴，我也很高兴。如今，我再也不会吃不好，睡不好了，通过给予他人，我找到了幸福。”

听到这里，贵妇哭了，她说：“凡是金钱能买到的东西，我都有，但是却失去了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幸福不是终点，而是旅程；幸福不是明天，而是现在；幸福不是依赖他人，而是取决于自己。幸福在于你是谁，而不在于你拥有什么。◇

突破网络封锁

1. 破网IP索取信箱：freeget.ip@gmail.com 发一个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十分钟内收到回信，拿到几个IP。最好用海外邮箱。邮件可能会被当作垃圾邮件，请检查垃圾文件夹确定是否已收到邮件。

2. 破网软件索取信箱

使用海外信箱寄一封信（标题不可空白）到以下邮址约十分钟就可以收到下载点。索取自由门freeget.one@gmail.com

3. 下载“自由门”软件

<http://www.dongtaiwang.com/>

4. 下载“无界浏览”软件

<http://www.wujieliulan.com/>

